



主编 袁正明 梁建增

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 编

用事实说话

中国电视焦点节目透视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用事实说话:中国电视焦点节目透视/
袁正明,梁建增主编. 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编.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ISBN 7-208-03561-X

I. 用... II. ①袁...②梁...③中... III. 评论性
新闻:电视新闻-电视工作-中国 IV. G22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0)第46982号

责任编辑 陈 军
美术编辑 王晓阳
封面设计 张国梁

用事实说话

——中国电视焦点节目透视

中国中央电视台新闻评论部 编

袁正明 梁建增 主编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绍兴路54号 邮政编码200020)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7 插页 8 字数 375,000

2000年10月第1版 2000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ISBN 7-208-03561-X/G·676

定价 25.00元

目 录

用事实说话——袁正明 梁建增 001

目

录

焦点访谈

(中央电视台)

焦点的报告	孙杰	002
诞生		003
被聘者的辛酸		010
制片人制		017
最初的节目		025
张金柱案前后		034
调粮补仓骗总理		043
重磅“炸弹”		053
特别节目		062
生死之间		072
水灾的日子里		082
体验失败		094
走向国际		105

隐性采访	118
软招与硬招	129
出乎意料	140
用事实说话	152
节目反馈	164
我与《焦点访谈》	敬一丹 177
燃烧激情	
——与白岩松倾心漫谈——	白岩松 孙金岭 204

新闻透视

(上海电视台)

《新闻透视》 透视新闻	蒋为民 孙泽敏 222
创业的脚步	223
镜头的视角	239
“曝光”后的麻烦	247
深层次的思考	260
采访中的花絮	267
我们的心和观众一起跳动	273
将新闻透视到底	吴琳 276

大写真

(江苏电视台)

写真《大写真》	曹云豹 294
起步	295
看不见的大堤	298
从丁帆到贺佳佳	306

徐州三院“历险记”	312
愿错要事件不再发生	320
修复我们的精神家园	329
让更多的谢芳丽站起来	338
《大写真》的故事	346
追求一流	356
你需要,我存在	
——简述《大写真》“主持人概念”的变化过程	
关田	358
“老同志”遇到新问题	
丁龙江	369

新闻广角

(河北电视台)

已做的和在做的	田榕林	376
开播前后		377
惊心动魄的采访		384
揭开白衣裹着的罪恶		402
撕下车祸背后的黑幕		411
来自内外的温暖		416
甜酸苦辣的内心体验		422
加强学习 不断思进		429
我与《新闻广角》	于良	432

今晚 8:00

(成都电视台)

八年风雨历程	叶文林	442
从《今夜 8 点追踪》说起		444

人间真情动人心	451
意想不到的轰动	469
工作着是美丽的	477
办出特色 求变求新	487
“蜕变”的经历	郭月 496
浮躁与沉淀	周东 521



中央电视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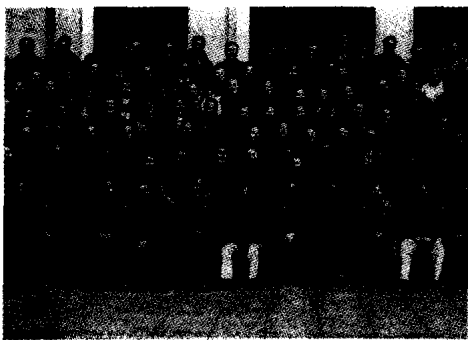
焦点访谈

焦点访谈

焦点的报告

孙 杰

1994年4月1日晚上19:38,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传出一段浑厚的男中音:“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



题评说,每日请看《焦点访谈》”。伴随着激昂的音乐,电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矗立在地平线上的简洁的城市楼群,一只由红、绿、蓝构成的大眼睛标志从中升腾而出。从此,这段日渐为人熟悉的《焦点访谈》片头,每天呈现在亿万观众面前;而成为《焦点访谈》栏目标志的大眼睛,从此刻注视着观众,关注着社会。

新闻评论部成立时,只有100多人,但当2000年拍下这张合影时,已经壮大到了近300人。因为人太多,照片太长,这里只能裁剪出局部。画面上的很多人,因为《东方时空》栏目的改版,而划分到了新成立的“《东方时空》工作室”,但是我们曾经在一起战斗过很长的时间。

* 作者系《焦点访谈》制片人,本文根据同事提供的材料编写。

诞生

说起《焦点访谈》，就不得不讲到《东方时空》。这不仅是因为两个栏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同属于新闻评论部领导，更重要的是，这两个栏目的出现有着因承关系。

1992年底，当时的中宣部新闻局局长徐心华找到时任中央电视台台长的杨伟光，传达中央领导同志意见：新闻媒体要注意抓群众关心的热点问题，请社会各界人士和专家、学者就这些问题发表意见，以引导舆论。

杨伟光听了有些吃惊，因为热点问题肯定烫手。当时中央电视台有一档新闻评论类栏目，叫《观察思考》，时常播出一些舆论监督的节目，在社会上影响很大，但制作播出的难度也很大。环境宽松时，节目可以“火爆”一点；稍紧一点，就免不了挨板子。好在那是一周一期，节目周期长，控制起来还比较容易。现在要求经常抓热点，每天把群众最关心的问题搬上国家电视台的屏幕，后果到底如何，杨伟光台长无法判断。因此，他对徐心华说，这样重要的行动，只口头传达很难贯彻，最好有文字的依据。不久，中宣部提出的1993年宣传工作要点里，写出了上述要求。事实上，这是中央领导决心实施新闻改革的一个步骤。

根据这一精神,杨伟光要求新闻中心策划一个早间新闻栏目,安排在清晨7点播出。之所以要放到早间,杨伟光是有考虑的,因为中央电视台没有办这种栏目的经验,难免在操作中出一些纰漏,早上看电视的人少,出了问题,影响也小,可以在重播时改正。

开办这个40分钟的新栏目,台里只抽出7个人,不够的人手要靠借用其他单位人员帮忙,或临时聘用一些编辑、记者。

筹办一个从形式到内容都全新的栏目,难度是非常大的。首先,新栏目的名字就颇费踌躇。筹备组最先报上来的名称叫《新太阳》。杨伟光给否了:“人家会以为你否定旧太阳呢。这个题目太多义,也太敏感。”

但新栏目筹备组的青年人却对《新太阳》这个名称情有独钟,想坚持到最后一刻。

杨伟光想的却很多:“你们不要坚持了,谁都知道过去把毛主席比作太阳,你又来一个新太阳,是什么意思。当然你们不一定这么想过,但有人看了会这么想,何必要找这个麻烦呢。到时候,你们没有责任,但我这个台长麻烦就大了。你们多想一些题目,从中再选择。”

最后,筹备组开列了20多个栏目名称。

杨伟光看后,在《东方时空》名称上划了圈,说:“这名称好。中国是东方的代表,时空的‘时’有历史感,‘空’有空间感,内容丰富,很有气势。”

1993年5月1日早晨,伴随着清新的“东方晨曲”,一个全新的电视新闻杂志栏目《东方时空》,出现在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中。

最初开办时,《东方时空》包括“东方之子”、“金曲榜”、“生活

空间”和“焦点时刻”四个子栏目，都是每天播出一期。

新栏目运作起来人手紧张，作为决策人，杨伟光看起来也心情紧张，害怕因为一些小的纰漏而导致新栏目夭折。最让杨台长担心的，还是“焦点时刻”栏目，因为它贴近生活，报道的都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难点和焦点问题。如果分寸把握不好，就会像《观察思考》栏目那样，几起几落。因此，在开播初期，杨伟光对于这个栏目从选题到审定节目，都是一手抓的。

随着《东方时空》栏目的成熟，节目越做越精，在观众中的口碑越来越好，社会影响也越来越大。开播仅仅半年多，《东方时空》中的“焦点时刻”栏目，就有两个节目在1993年“全国电视新闻奖”评选中，获得评论类的一等奖，其中一期节目还在当年的“中国新闻奖”评选中获得二等奖。社会各界对于这个栏目也是好评如潮，有专家称“《东方时空》对电视改革是革命性的发展”。一种通俗的说法是，“《东方时空》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早晨不看电视的习惯”。

《东方时空》成功了，特别是其中的“焦点时刻”，更是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就在《东方时空》办得如火如荼的时候，杨伟光台长又在思考中央电视台下一步的改革方案。他找到当时主管新闻的副台长沈纪，说：“如果在黄金时间办一个类似‘焦点时刻’的焦点节目，难度很大，风险也大，但如果把握好，轰动效应也会很大。你们敢不敢干？敢干，《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间给你们。”

几天后，沈纪副台长找到杨伟光：“杨台长，我们敢干。”

1993年12月，中央电视台成立新闻评论部，划归新闻中心领导。评论部一方面保证《东方时空》的正常播出，一方面筹划开办晚间的焦点栏目。

如果说《东方时空》是横空出世的话,那么《焦点访谈》在中央电视台还是找得到亲戚的,那就是《观察思考》栏目。当时,负责这个每周 20 分钟节目的采编人员,包括一些临时借调的摄像,有 10 多人,他们成为新开办栏目的“元老”。

新栏目是一个长度为 13 分钟的新闻评论性节目,每天播出。对于这样一个制作规模,仅有 10 多人显然是远远不够的,但台里又抽调不出更多的人员。因此,新栏目开办伊始,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人才缺乏。

好在台里给了政策,人员不够,可以到社会上招聘。

于是,中央电视台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向社会招聘编辑、记者的活动开始了。

在 1993 年的时候,电视传媒远没有今天这么热门,而且人们对“招聘”这种形式也还比较陌生。《焦点访谈》筹建组在梅地亚宾馆设立了报名处,兼负咨询和解释工作。当时,前来看“热闹”的人比较多,主要是北京一些报纸、杂志的编辑、记者。当他们了解到“招聘”不等于调入时,很多人打起了退堂鼓。因为这意味着先要辞去原来的工作,把档案转到人才服务中心,原来那份稳定、舒适的工作就此失去。招入中央电视台后,在工资、福利待遇上与正式职工基本一样,但正式职工最为实惠的福利待遇,即公费医疗和福利分房不在此列。而且,当时也没有一个招聘人员责、权、利的细则规定,比如以后职称如何评定、养老金怎么办、招聘人员能不能晋升领导职务等等。由于很多问题当时都没有“说法”,不少人放弃了这次机会。几年后,当《焦点访谈》办得如日中天、万众瞩目,而且中央电视台的招聘制度也逐步完善起来的时候,当初打了退堂鼓的一些人感到十分懊悔。

最后,这次招聘活动有近 800 人报名。招聘领导小组经过

初步审核后,向300多名符合条件的人员发出了笔试通知。那些非主持人不干的俊男靓女,第一关便被淘汰。

笔试考场设在一所中学里,考题是自选题目,设计一期电视新闻专题节目。由于参与者大多是各种媒体人员,有的本身就是电视界的从业者,所以这道考题的难度并不算大。到后来,中央电视台统一进行招聘考试时,就增加了很多时事和文史哲方面非发挥性的题目。

经过笔试,有80多人被筛选出来进入面试。

1994年1月19日,面试开始。考场设在梅地亚中心的多功能厅。偌大的一个大厅,摆了三排桌椅,组成凹字形,30多位考官分列其中。主考官是沈纪副台长,此外还有新闻中心的领导,新组建的评论部的领导,以及新栏目筹建组的负责人和《东方时空》各栏目的制片人。考场的气氛凝重而紧张,每次测试一个人。应试者走进铺着厚厚的猩红色地毯的大厅,便要孤独地面对周围30多名考官。这时对人的心理压力是异常大的,一些笔试成绩很好的应聘者,竟为这种气势压倒,紧张得说不出话,或者是答非所问。

面试颇像电视里的智力竞赛,主考官发问很急,咄咄逼人。主要是就一些经济、社会现象提出问题,让应聘者解释,如1993年下半年为何建材价格波动等等。据一些考官事后“交代”,他们也是临时抱佛脚,头两天才从《半月谈》中的“时事问答”栏目扒题目。好在这些问题对于从事新闻工作的应聘者来说,属于常识性内容,答起来并不费劲。

最后,80人中有50名应聘者通过面试。1994年春节后,这些人经过三天的集中培训后,一般按照自己最初的志愿,分派到各组。其中有近20人到了新筹办的栏目《焦点访谈》,他们与

《观察思考》的人马一同成为新栏目的创业者；其余的人分到了《东方时空》各栏目和评论部新组建的编辑组。

进入3月，离新栏目的开播只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新招聘人员在老编导的带领下，一方面熟悉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业务，一方面要尝试制作节目。这又带来一个问题：新加入《焦点访谈》的应聘者，大多没有告诉原单位自己已准备“跳槽”，因为他们还无法判定自己是不是能适应新的岗位，所以给自己留了一条后路。同时，中央电视台对于招聘人员有规定，先试用三个月到半年，到时不能称职者，敬请走人。招聘人员有试用期，这是通行的规定，无可厚非，但这也给应聘者带来前途未卜的心理压力。

新栏目即刻要上，人员必须到位，这样，那些对原单位半遮半掩的手法就行不通了。应聘者面临这样几条路：

★
☆
☆
☆
☆
一、与原单位摊牌，求得理解，办理临时借调手续。如果最后能被中央电视台“招安”，再与原单位“拜拜”；如果干不下去，再回原单位上班。这是一条旱涝保收的上策，但走这条路，难度极大，它要求应聘者与原单位领导有极好的私人关系或是有很硬的社会背景，因此用此上策的应聘者多是来自地方电视台的人员。

二、继续瞒着原单位，以各种手段请长假，偷偷到《焦点访谈》“打黑工”，试用期满再见机行事。一时间，一些理论上患有“肝炎”、“肾炎”的青年人，活蹦乱跳地出入中央电视台。当然，对于他们来说，这也是一种无奈。

三、以上两条路都不通，唯一的选择就是与原单位一刀两断，跳槽辞职，把关系转到人才服务中心。这个抉择对应聘者是极其痛苦的。因为面临这种处境者，原单位大多是不错的地方，

或是著名的大媒体、有权力的党政机关，或是效益不错的报纸、杂志，而这些人又大多是单位里的业务骨干，属于上升力量。这些人如果与原单位“决裂”，几乎意味着把原来的努力和成绩一笔勾销，一切需要重新开始，从头创业，而自己面临的却是难以卜料的前程。如果自己经过一段时间，发觉并不喜欢新的工作，或者经过努力，最终无法适应新的岗位，自愿或被迫离开《焦点访谈》的时候，他们将一无所有，原单位是肯定回不去了。一些人很现实地意识到这个问题，仅在中央电视台呆了几天，就默默地离开了。这是《焦点访谈》第一批自然淘汰的应聘者。当然，还有一些人背水一战，自断后路，留了下来。

有一位应聘者，原是国内一家著名新闻机构的编辑，自大学毕业后，他在这个单位工作了七年半。在这期间，单位为培养他，让他带薪脱产读了两年英语专业；之后，又让他作为访问学者，派到美国学习、交流了一年。当他把辞职报告送到单位领导的案头时，这位领导是一脸的无奈：“我们如果不培养你，害怕以后你不能适应我们事业的发展；我们花这么大力量培养你，我们的事业又不适应你的发展了。我们该怎么办呢？”对此，这位跳槽者确实是无言以对，愧疚不已。在这种情形下，如果想吃“回头草”，姑且不论原单位是否答应，恐怕跳槽者自己也会感觉无脸再对“江东父老”了。

好在很多单位的领导都比较开明，没有过多刁难这些另谋“高就”者。事实上，社会上还有不少的优秀青年正在“覬覦”这些单位，千方百计想进来呢。因此，他们也并不缺人。

最后，到试用期满的时候，留下来的应聘者，基本上都被中央电视台正式招聘了。

被聘者的辛酸

新闻评论部成为中央电视台人事制度改革的试点,但由于是第一个“吃螃蟹”的,没有任何经验借鉴,所以滋味并不好尝。

1993年,《东方时空》开了招聘人员的先河,人事部门拿出一个计划,招聘人员工资一个月280元,没有工作证、没有医疗保险、不分配住房。当时力主改革的台长杨伟光看后笑了,说:这哪是在招聘编辑记者,是找清洁工嘛。

后来,台里出台了正式规定,招聘人员与正式职工在政治上一律平等,可以入党,可以评先进,可以提干(最高能担任处级干部,因为提拔副局级以上干部要通过广电部了),工资也有了较大幅度提高。

由于这些规定都是慢慢完善的,在《焦点访谈》开播筹备期间,记者们、特别是招聘来的青年人,在工作中还是有很多难处。首先是“身份不明”。跟人联系工作,只能笼统说是中央电视台的,因为栏目未开播,解释也解释不清。新招聘的记者们也没有证件,大多是揣着中央电视台的介绍信,却拿着原单位的记者证。搞批评报道时,对方逼急了,就一块儿拿出来给人家看。也

许是那时人们的自我“维权”意识还不高，也不曾出过什么事情。有一个有趣的现象，在《焦点访谈》影响还不大时，记者们出去采访，爱说自己是《东方时空·焦点时刻》的，省得介绍起来麻烦。后来，《焦点访谈》名气大了，《东方时空》的“焦点”栏目记者，则爱说自己是《焦点访谈》的。由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两个栏目从节目到记者都有交叉，所以这样讲也没什么错。

曹荭是《焦点访谈》最早的应聘者之一，她原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编辑。曹荭参与制作的第一个《焦点访谈》节目，是到上海采访“蒙妮坦奇妙换肤霜”的虚假广告宣传。由于当时栏目还在筹办时期，经费比较紧张，加上这个节目又是试验品，不知能不能播出，所以更不敢乱花钱。为了省钱，摄制组在上海徐家汇外的市区边上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下。一次，曹荭到地处外滩的一个政府机关联系采访。回旅馆的时候，曹荭搞不清这种只联系没拍摄的事情算不算“完成任务”，打出租车的钱能不能报销，加之她对上海的公交线路又不熟，于是选择了一种最保险的方法：开步走。结果，曹荭一路打听，用了近4个小时，才回到住地。当然，她也顺路浏览了沿途的街景。

在这个节目中，曹荭要在上海南京路的天桥上作一段串场。在此之前，她从未面对过摄像机的镜头。曹荭的搭档、摄像记者朱邦录告诉她：见到镜头摇过来就开口。但不知为什么，曹荭一看见那似乎深不可测的镜头，就张不开嘴。一遍，二遍……就是过不了。周围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曹荭有些难为情，将话筒塞给朱邦录，不想拍了。一向好脾气的搭档火了，走过来低声对曹荭说：“丫头，你今天要是说不出来，就别想在《焦点访谈》呆下去。”曹荭最后战战兢兢地出了“镜”。这第一次出镜被形容为“作蔬菜状”。